

## □ 名师轶事

金的《家》是很值得好好看的，有的时候，一个真正作家的作品能深刻反映时代的需求和特点，巴金的《家》就是这样的。”即使对于与巴金的冲突，李长之

后来在回忆时也颇为怅然地说：“我虽然不再怪巴金，但巴金是否释然，是还不一的。”

（原载《人物》2010年11月，总第261期）

# 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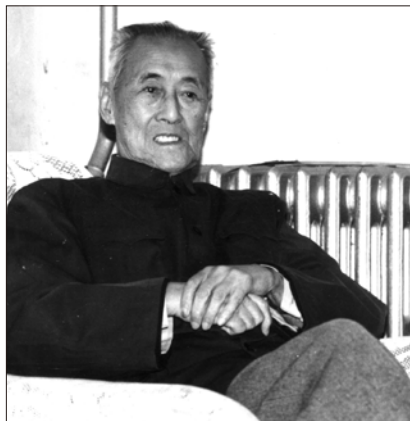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纪念陈岱孙先生

○王林生（1952经济）

陈岱孙先生逝世后，学术界有很多文章称颂先生的治学为人，却很少述及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情况，有之也多语焉不详。1948—1952年我负笈清华经济系，曾亲炙教益，今就记忆所及，追述片断往事，旨在拾遗补阙，为先生的行状添加一个小小的脚注，同时也想借“百年校庆征文”之机，表达个人感念先生的教诲之恩。

本文所记均为先生在课堂内外的言行，当时耳闻目睹者，少则十余人，多则百余人，虽事隔半个多世纪，而今尚有健在者，如我所记有误，望予订正，庶不负先生教导我们的严谨不苟、言必有据的实证精神。

首先，从在同方部上“经济学原理”课说起。先生在黑板上大书两行英文字：Elementary Economics, by Fairchild, Furniss & Buck, 要求同学们预备好教科书，下次正式开讲。听高年级的学长们说，先生授课不写中文，试卷也用英文，而讲课则叙述清晰，条理分明，无冗词赘语，每当下课铃响时，刚好告一段落，记下来便自成章节，是一份好讲义。后来我整理笔记，



陈岱孙先生

验之信然。1948年是解放战争发生“伟大转折的一年”，革命高潮迭起，我们从进步书刊中吸收到的思想，与教科书介绍的知识产生了矛盾。例如，教科书说“资本”是means of roundabout production, 源于推迟的或节余的消费，于是天桥卖艺者的道具也可属于“资本”范畴。又例，“价值”决定于边际效用，书中借喻五桶水对个人效用的主观评价，按其用途的重要性依次递减。这些内容与“劳动决定价值”、“资本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”等

说法大相径庭，同学们一时不无微词。其实，那时我们对王亚南、郭大力译的《资本论》还啃不动，也消化不了，所接受的是河上肇著作的中译本和一些马列入门书，在理解上也很肤浅，故在对待复杂的学术问题时，往往以革命的激情代替理性的思维。但我们仍能领会到先生在讲授中的一些真知灼见，而且受益终生。例如，1949年夏课程快结束时，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：Social Philosophy, Scientific Analyses, Practical Technique;大意说欧美的经济学在社会哲学上固不足为训，但其分析方法仍有长处，而其实用技术则更须学习。此说我至今未忘，在我执教的对外经贸大学讲课时也一再引用先生的这一说法。就在这一堂总结式的讲课中，先生还说经世致用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，经济学是“经国济民”之学，但这样的槃槃大才，今既难求，古亦罕有，杜工部诗云：“古来经济才，何事（故？）独罕有”，

可谓古今同慨。不过把在学校求得的知识贡献给社会，这是你们人人都应做得到的。这可说是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和勗勉，至于那一联诗，我不知出处，从未核对，个别的字可能有误，但确记为杜诗无疑。1951年夏欢送经济系应届毕业生的会上，先生也表达过学以致用思想，地点在工字厅，至少约有百余人，可谓济济一堂。由于人多，又值盛夏，记得门窗洞开，可望见槛外荷塘中莲叶田田。先生端坐致词说：到东北去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建设，这是很光荣的事，但在学校读的课程，未必都用得上，有的可能是“屠龙之技”（按：这四字是原话，确信记忆无误），但读书明理，对你们在社会上待人接物、行事处世，还是有用的。这与今天我们认为对学以致用不可狭隘理解，在精神上是一致的。

院系调整前四年中，先生没有公开发表什么文章，记得似乎只在社会系吴景超



清华大学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届  
学生与陈岱孙先生合影

## □ 名师轶事

教授主编的《新路》杂志上，撰文讨论过通货膨胀问题。这个刊物存在的时间极短，到1949年初就停刊了。在那个急剧变革的年代，各种思潮激盪碰撞，这个刊物的名称本身就突出了所谓“中间道路”的政治倾向，但决不能据此与该刊撰稿人的政治倾向等同起来，先生即属此例。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，势如破竹，国民党政府安排专机，要胡适劝驾，请平津一带的名教授南飞。据传先生也在被邀南下之列，因此我们经济系一些同学便到新林院陈宅去探听，先生当即表示：我身无长物，清华便是我安身立命之所，决不去南京。可见先生是将自己的进退去留与清华广大师生联系在一起的，实际上这已将个人的命运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联系在一起了。这样的选择表明先生决心跟上时代的步伐，1952年春，先生在大礼堂向文、法学院师生讲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总结时，也表明了这样的决心。在先生的主持下，1949—1950年王亚南先生在清华经济系任教，讲授马克思经济学，王回任厦大校长后，又请郭大力先生从青龙桥马列学院每周前来主讲一次。先生自己主讲的财政学课程所开列的参考书目中，除英美典籍外，也将马恩著作和千家驹的《新财政学大纲》等列入，可见先生在学术上正不断地跟着时代前进。1952年院系大调整，先生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学院副院长、代院长，这是一所由北大、清华、燕京、辅仁四校经济系部分师生组成的仿效苏联模式的学校，但一年后又告停办，先生终于去了北大经济系，因为这时清华被调整成了工科大学。1952年我们离校前夕趋谒先生表示惜别之意，当时先生也因即将离开

清华而黯然神伤，座间一时相对无言，终于匆匆而别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在有关的会议中我多次得晤先生，劫后重逢，恍若隔世。1984年春北京外贸学院改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，我承乏校务，特恭请先生到校参观，由罗承熙学长陪同前来，罗在西南联大曾随先生当研究生，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，解放初回国到外贸部研究所工作，今移居美国。参观后先生又向贸大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演讲，勉励大家要学好外贸专业知识，并提及清末郑观应曾主张商战乃国家富强之道。但当时听众大多不知郑观应为何许人，事后我还给他们介绍其人其书。

1993年我参加全国政协，与先生和王传纶老师同在经济界组。传纶师原随徐毓楠先生作助教，后留学英伦，解放初从英国回清华任教，故是我的师辈，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分往人民大学财政系任教。政协开会期间，每晚我必随传纶师到先生下榻处问候起居，先生是连任多届的老委员，时已年逾九十，携杖而行，开大会时，从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下，我扶着先生拾级而上，后来几年先生均告假，不再出席，这时我感到先生真的已垂垂老矣。犹记1948年入学时，初见先生时的情景恍如昨日，戴呢帽，衔烟斗，西装革履，望之俨然，那时晋谒先生，言谈举止都不敢造次。但离校以后，相与过从，方觉先生是蔼然长者，可亲可敬。先生晚年气度更见沉稳安详，淡泊宁静中含着睿智，卓然益显大师风范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”。谨以此言，移赠先生，作为我对先生的纪念。